



灌云报

GUANYUNBAO
责任编辑 侍述清 陈洪艳

2021年11月25日 星期四

编辑电子邮箱: gyssq@163.com

陈延年:29岁牺牲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

陈延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，1922年入党，1924年从苏联回国后先后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、中共江浙区委书记、中共江苏省委书记、中共五届中央委员、政治局候补委员等职，1927年牺牲时，年仅29岁。他短暂的一生为党的建设和大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，毛泽东称他“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”。

求真务实的“小列宁”。1898年，陈延年出生于安徽安庆，是陈独秀的长子。在其父的影响下，陈延年从小就自食其力，立志“自创前途”。1919年12月，陈延年与一批热血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。留法期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与周恩来等人创建旅欧共产党早期组织——中国少年共产党，并被选为旅欧少共中央执行委员之一，担任宣传部长，负责编辑被称为“巴黎的《新青年》”的旅欧少共机关刊物《少年》月刊。

1923年春，党中央决定派陈延年、陈乔年、赵世炎、王若飞等12人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。陈延年学习勤奋、思想活跃，每逢开会议论，尤其是在辩论一些政治原则问题时，他总是慷慨激昂、出口成章。当被问及为何在理论争辩时与平常的沉默寡言判若两人时，他说：“列宁在争论原则问题时如同猛狮，我们应该向列宁学习，在原则问题上不能半点马虎。”于是，同学们都敬佩地称其为“小列宁”。

甘当车夫的领导人。1924年夏，党中央决定抽调留学的同志回国工作。同年10月，陈延年回国后被党中央派赴广州，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。

担任领导职务的陈延年为了能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，大力开展工农革命运动。到广州之初便去黄包车夫馆与黄包车夫交朋友，学说广东话，谈人生和社会革命的道理，丝毫没有领导人的架子。他和车夫一起拉黄包车，了解他们的疾苦。他身体结实，拉起来车强劲有力，活像个老练的黄包车夫。他替年老病弱的车夫出车赚回的钱全部交给车夫。因此他在车夫中威信越来越高，大家都把他当作自己人，称他为“老陈”。人力车工会也因此很快组织起来，发展了大量党员，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。

周文雍曾问陈延年：“香港的《工商日报》刊登文章说，共产党的干部当人力车夫。说的就是你啊！”陈延年笑着说：“如果工作需要，不论任何同志，去当手车夫都是光荣的。”

坚持“六不”的苦行僧。陈延年生活清苦，认为“铺张浪费是最大犯罪”。这句话是1924年12月25日，陈延年在广东区委的第一次见面会上说的。那时，区委刚在黄国樑与全国总工会协调下，租得了文明路75号至81号二、三楼为党团区委地址，经济来源全靠党团员每月上缴的月费维持。陈延年领导下的区委能省就省，每次政治示威大游行所用的横幅和标语，都由负责人出钱买红布和纸张，自行解决。

不仅工作中如此，生活上他也极为简朴。在担任党内重要职务期间，陈延年仍旧处于居无定所的状态。在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之后，他却又因同事结婚无房而主动让出，自己和另一位同志挤进了一间只有几平方米的小阁楼居住。他的卧室常年只有一套床板、一张席子、一条很粗糙的毛毯和一床被子。即使是担任党内重要职务之时，他仍坚持除基本生活需求之外一切工资交予党。他积极支持工人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，多次为此捐赠经费，自己则通过着箪食瓢饮的清贫生活。

由于陈延年处处严于律己、以身作则，因此被称为党内有名的“六不”干部，即不照相、不看戏、不闲游、不上饭馆、不讲穿着、不做私交。

情报事业的推动者。早在留法期间，为便于秘密活动，陈延年就培养了极强的情报意识，为日后推动情报保卫工作打下了思想基础。

陈延年任书记期间，广东区委曾向苏联为中方举办的情工培训班选送工会会员、农民组织成员、罢工者。1925年11月在广东举办情报与反谍骨干速成班，24名学员毕业后，由时任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兼组织部长、共产党员谭平山将其中7人分配到广东区委情报小组负责人傅烈、杨殷手下从事情报反谍工作。

1926年春，国民党右派阴谋破坏国共合作。陈延年专门召集会议研究对策，建立情报小组，搜集国民党方面的信息。情报小组的成立，为我党此后专职情报机构建设作出了重要尝试。接受任务后，小组成员奔波于广州、黄埔、东莞、石龙之间，有时西装革履，出没于茶楼酒肆；有时一身戎装，进出于军港要塞；有时青衣小帽，往来于平民百姓之家。在陈延年的部署下，小组成员充分发挥同志们的机智勇敢和集体智慧，搜集到许多有关方面的信息，为区委正确判断形势和确定方针政策，提供了可靠依据。

站着赴死的革命者。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中，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妥协退让政策。陈延年对此坚决反对，他以中共广东区委的名义报告党中央，要求中央坚决抛弃对国民党右派的妥协退让政策，并表示陈独秀和自己虽然是父子关系，“但我是共产党员，我坚决反对妥协退让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。”

1927年4月，陈延年赴武汉参加党的五

往事·网事

关注“今日灌云”微信公众号
掌上阅读《灌云报》

范仲淹登临大顺城，感慨万千，写下名篇《渔家傲·秋思》，“四面边声连角起”“千嶂里，长烟落日孤城闭”，雄浑苍凉难掩壮志豪情，父子同心、将士用命，共守国泰民安。

范氏家风，后世称颂。范纯祐天资聪慧，“方十岁，能读諸书”“为文章，籍籍有称”，誉之神童，已不为过。然而，纯祐不慕功名，“不应科第”，陪伴父亲左右，以安诸弟之心。范仲淹曾评价诸子，纯仁得其志，纯礼得其静，纯粹得其略，纯祐未有评语，实得其孝。百善孝为先，有子如此，父可大慰平生。父子同行，世间至乐。

战场父子兵——范仲淹与范纯祐

公元1038年，西夏元昊称帝，开始持续袭扰宋朝边境，西北局势不断吃紧。1040年，宋军大败于三川口，朝野震惊，范仲淹从越州任中北上，被举荐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，主张积极防御，以待战机。1041年，宋军在好水川战役中再次失利，范仲淹转任管勾环庆路部署司事兼知庆州，上攻守二策状，试图破解西北危局。战场风云变幻，国家重任如山，良策尤需良将，范仲淹幸有长子范纯祐如影随形。

以静制动

范仲淹对于西北边务形势有深刻认识，“西戎居绝漠之外，长河之北，倚远而险，未易可取”。西夏民风彪悍，具备所有游牧民族的传统优势，“风集云散，未尝聚养”，作战机动灵活。比较敌我优劣，范仲淹认为，“国家用攻，则易取其近，而兵势不危”。“用守，刚必图其久，而民力不匮”。在这种思维主导下，屯田戍边是稳中求进之策，须在关键位置加强军事守备。

西夏骑兵虽强，但非大开大合，而是反复袭扰。在边境地带，西夏筑有金汤、白豹、后桥三处寨堡，楔入宋朝领土，不仅阻断了延州、庆州之间的联系，使宋军前后不能相顾，同时为骑兵提供了稳定的后勤补给，便于实施袭扰之策。范仲淹建议，一方面要重点攻击这些西夏寨堡；另一方面要修筑己方的城寨，“大为城寨，以据其地”“方诸旧寨，必倍其数”。不仅要扩大已有寨堡的规模，还要增加数量，形成环环相扣的防御体系，以静制动，步步为营压缩西夏骑兵的活动空间，此为固本制敌之策。

虎口涉险

良策在胸，何处破局？范仲淹首先想到要重建筑于20年前的大顺城。此处与金汤、白豹、后桥针锋相对，能够与西北方向的柔远寨、东北方向的荔原堡形成呼应，切断西夏骑兵的袭扰路线。但在西夏强大骑兵的鼻息之下，大兴土木修筑堡垒谈何容易，须有胆识，更要有担当，谁来承担这项艰巨危险的任务？

打虎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。范仲淹对长子纯祐委以重任，要策划一次瞒天过海的军事行动。范仲淹生有四子，长子纯祐始终侍奉左右，成为父亲的得力助手。范仲淹曾在苏州工作，经兴办教育，学生众多，但不服管教。当时纯祐年仅10岁，在学生中年龄最小，却严守学校规矩，成为其他学生的榜样，学风渐渐好转。知子莫若父，知父莫若子，纯祐要和父亲同心协力，共同完成看似不可能的任务。

1042年3月，宋军分批次从庆州出发，行动极为保密，诸将事先不知此行的目的地，只知道向东挺进。范纯祐和番将赵明带领精锐前锋先行，范仲淹领主力紧随其后。当前锋行至大顺城，后军抵达柔远寨，范仲淹突然下令，前军就地驻扎，开足马力修筑大顺城；后军向北高度警戒，防止西夏骑兵突袭。范纯祐率军就地取材、因地制宜，充分利用山形地势，采取“削坡为墙”和“夯土筑版”相结合的方式日夜赶工。仅仅10天，在二将川河与铁匠沟水交汇处南侧山梁之上，全新的大顺城巍然矗立，居高而下，“百万雄师，莫可以前”，成为前沿坚实的战略支撑点。

不动如山

宋军修筑大顺城，无疑是爆炸性消息，西夏发现之后，立即派遣三万骑兵来攻，准备在坚城未起之际，一举除去心腹之患。然而范仲淹对此早有防备，集结本部主力，在大顺城外围摆下堂堂之阵，严阵以待。西夏军无机可乘，在交兵之际佯装溃败而走，试图引诱宋军主力远离大顺城。面对大大“胜局”，范仲淹保持了清醒头脑，节制诸部，急令不可追击，以防敌军设伏。事后证明，范仲淹的担心不虚，西夏军果然设有埋伏，但没有得逞，只能悻悻退去，“以重兵戍金汤、白豹两城”，龟缩回己方据点。

大顺城完工之后，很快发挥出更大作用，一是自通经脉，宋朝西北的延、庆两州连成一体，诸部兵马可以相互支援；二是震慑西夏，其有生力量被牵制在白豹、金汤诸城；三是断敌袭扰，大顺城地势险要、易守难攻，西夏不能再有所顾忌南下侵犯宋境。此后，在范仲淹的推动下，宋军在西北屯田戍边、修筑寨堡，极大地限制了西夏骑兵，攻守之势相易。1043年正月，西夏主动提出议和要求，宋、夏于次年4月达成和平协议，西北局势恢复平静。

修筑大顺城虽然风险极大，但却是扭转西北局势的关键。范仲淹、范纯祐父子上阵，父不以子忧，子不以事惧，父子坚兵浑然一体，共成军国大事。据

本报稿件均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报观点

大时，中央任命他接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。他当即转赴上海，途中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。政变后，全国形势风云突变，在极为严酷的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，他不顾危险，有条不紊地部署工作，为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积极开展斗争。

6月26日，陈延年遭国民党军警逮捕。敌人得知他身份后，用尽酷刑将他折磨得体无完肤，逼迫他供出上海的党组织。但陈延年始终以钢铁般的意志，严守党的机密，宁死不屈。

7月4日晚，陈延年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。行刑前，面对敌人的屠刀，他昂首挺胸，视死如归。敌人喝令他跪下，他巍然屹立毫不理会。敌人将他强行按倒，正要行刑，他猛地一跃而起，使刽子手的刀砍了个空。最后，恼羞成怒穷凶极恶的敌人一拥而上，将他乱刀杀害。

他离去时是少年身，归来时是英雄魂。

火线诸葛亮：军事民主的生动实践

在战场上，敌情是瞬息万变的，认识掌握敌情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。如何在战场上及时分析研判已经变化的敌情，研究出切实有效的制胜战法，这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进程和结局。火线诸葛亮会，就是我军根据战场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创造的克敌制胜法宝。

火线上的伟大创造

在毛泽东看来，多打胜仗，或者少打败仗的关键，就在于把主观指挥和客观情况“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。”然而，“统统相符合的事，在战争或战斗中是极其少有的”。造成主观指挥与客观情况出现偏差，既有主观的因素，也有客观的因素。比如，战场情况出现了“非所预料的和不可抗的变化”，这就是客观因素。火线诸葛亮会是我军根据战场上遇到的突发情况，处置紧急军情的一个伟大创造。

解放战争时期，我军在陕北蟠龙战役和晋察冀石家庄战役中，利用战斗间隙，在战场上召开连排干部会、班战士会，发动大家讨论如何攻克敌人的坚固堡垒阵地，研究出克服困难、战胜敌人的许多新战法。融入了群众智慧的这些战法，对于我军攻克敌阵、打赢战争发挥了出人意料的作用。我军在火线上创造的这一作战经验，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。1948年1月30日，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《军队内部民主运动》中，充分肯定了作战中实行军事民主的做法，就是“实行在火线上连队开各种大、小会，在连队首长指导下，发动士兵群众讨论如何攻克敌阵，如何完成战斗任务”。这一创造在陕北蟠龙战役和晋察冀石家庄战役中，都实行了，收到了极大效果。

战场上的显著威力

在解放战争初期的西北战场，西北野战兵团面对十倍于我的敌人，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“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”“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”等战略方针，灵活运用“蘑菇”战术，先后在青化砭、羊马河和蟠龙镇取得了西北战场的“三战三捷”。

与青化砭战役、羊马河战役不同的，是1947年5月发起的蟠龙战役是西北战场的第一次攻坚作战。蟠龙镇是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的重要补给基地，敌人依托蟠龙周围高地设置主阵地，修有很多地堡、碉堡工事，形成交叉火力网。在蟠龙战役之前，我军根据敌人急于寻找主力决战的企图，将计就计，派出二纵三十五旅和其他各旅抽调的小部队，配合绥德分区和黄河边的晋绥军区第三纵队独五旅，造成我军向绥德撤退、东渡黄河的假象，诱使胡宗南部主力北上绥德。但是，敌人在蟠龙镇仍留有精锐6700余人防守。对于解放战争初期缺乏重炮武器和攻坚经验的解放军来说，这无疑是一次硬仗。正如彭德怀在作战会议上所说：“如果说青化砭、羊马河两仗我们是吃了两块肥肉，那么，蟠龙这一仗我们要准备啃骨头，要切实做好攻坚打硬仗的各项准备。”

蟠龙战役打响后，攻击部队发现敌人的力量超出了战前的侦察和判断。“原来以为敌人只有一个旅，谁知一打起来敌兵力不只一个旅，还有两个指挥部”，再加上敌人占据着坚固工事和强大火力的优势，致使我军伤亡大增，未能顺利突破敌人主阵地。

在进攻受阻之际，是撤退还是再战，考验着指战员的意志、胆魄和智慧。彭德怀、习仲勋果断决策，命令部队停止攻击，“巩固已得阵地，进行近迫作业。主力在适当地点休息，开连排干部会、班战士会，讨论如何夺取主要阵地”。连队战士分组讨论，纷纷献计献策，找到了对付敌人碉堡和火力网的办法。比如，针对我军攻坚缺少重炮的实际，采取对壕作业逐步贴近碉堡，即“挖S形交通壕，两侧挖猫耳洞，边挖边巩固，逐渐逼近敌前沿”。逼近敌堡后，“靠人工爆破，把粉状炸药装入干粮袋里捣实”“把炸药袋子挂到碉堡上爆破。战士们称之为‘膏药战术’”。通过这些打法破坏了敌人的工事障碍物，成功瓦解了敌人的防御体系。

机制上的集中研判

火线诸葛亮会，实质上是我军正确地运用军事民主，集中群众的智慧，灵活处置火线上遇到的非所预料的重大变化，创

造的一种敌情实时分析、集中研判的有效机制。在石家庄战役中，这种火线上的敌情分析研判机制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。石家庄战役是1947年11月晋察冀野战军和所属部分地方武装发起的攻坚战，开创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大城市的先例。在战役中，“各部队都开了许多诸葛亮会，许多困难都经过群众的力量解决了，攻克要点云盘山，就是个明显的例证，真正做到了边打边学，大家想办法。”

云盘山是石家庄东北角的唯一制高点。山上筑有三层地堡，山脚下挖有内、外两道壕沟，被敌人吹嘘为“铁打的云盘山”。在攻击未果的情况下，我军指战员利用战斗间隙召开诸葛亮会，发扬军事民主，研究新的攻坚打法。比如，为加强对敌火力的压制，研究“把支援火力分成八个组，重新规定射击目标，调整步炮协同动作”；为了增强直瞄破坏射击的火力，研究了迫击炮平射打碉堡的方法；还决定利用黑夜摸入壕沟内，在两道壕沟内壁上半部都挖洞埋炸药爆破。等再次攻击云盘山阵地时，这些打法发挥了关键性作用，从攻击开始到占领，仅只十分钟，伤亡十余人，成为攻坚战的范例。

解放战争的实践证明，火线诸葛亮会是我军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。邓小平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所作的《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》中，深刻揭示了人民解放战争伟大胜利的原因，特别提及“在火线上开‘诸葛亮会’”等一些小事，指出“伟大胜利，正是同这些小事分不开的”。而火线诸葛亮会之所以能够孕育，又得益于我军“在部队内部建立了能够充分发扬下级官兵积极性的同志式的关系，并且依靠群众，总结每次战争的经验，从战术到战略都不断地得到进步”。

雍正继位后，他接手的其实不是令人羡慕的盛世，而是康熙创造的盛世之后留下的一个吏治腐败、效率低下、国库空虚的烂摊子。但他勤于政事，励精图治，经过整顿吏治、改土归流、火耗归公等一系列重大改革，使经济发展、政局稳定、国库充盈。在整顿吏治中，不容庸官懒值得称道。

雍正对封疆大吏极为重视，要求他们不仅限于清、慎、勤，而且须具全才、勇于创新、敢于担当。他在论述巡抚职责时说：“巡抚一官，原极繁难，非勉能清、慎、勤三字便可谓胜任也。用人虽不求备，惟至督抚必须全才，方不有所贻误。”他对湖南巡抚王国栋这样评价：“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清、慎、勤三字朕皆评之，然不能扩充见闻，毫无益于地方，殊不胜任。”故革其巡抚职，召回京师用为侍郎。雍正要求封疆大吏不仅清正廉洁，而且敢于担当。雍正八年，代理湖广提督岳超龙表决心说：为报答皇上厚爱，我一定做到廉洁自律、两袖清风。雍正不以为然，批示道：要求太低了吧！当官本来就不该贪，这算什么高标准？如果只满足于“清官”的好名声，却倒了油瓶不扶，不就是绣花枕头吗？雍正认为，清廉是官员的起码条件，否则一切免谈。贪能误国，懒也误国，无所作为的“清官”就是庸官，跟利欲熏心的贪官一样，都不是好官。

雍正要求省级以下地方官员有作为、敢担当、不平庸。山东曹县知县王锡阶，在到任一年多的时间里，对20多起命盗案件没有一件审完，也没有拿获一名犯人。虽然他没有贪赃枉法，但雍正认为，不干事本身就是失职犯罪。他不仅被罢官，还坐了5年大牢。直隶吴桥知县常三乐，廉洁安分，但他胆小怕事，以至于地方好多事久拖不决。直隶巡抚李维钧要把常三乐从县令职位上调开，吏部却以常三乐没有什么劣迹为由不予批准。雍正得知后指出：常三乐当官软弱，实属失职，应当免去官职。雍正七年（1729），台湾凤山知县彭之昱对番民仇杀之事不能及时处理，事后还称病推卸责任。雍正得报指示：“此等劣员万不可姑容，况在台官尤为切要”，随即不干实事的凤山知县彭之昱撤职。

雍正对兵部官员要求极严，绝不允许平庸无为。云南开化总兵仇元正，人本老实，但因年过花甲不免疏懒，办事勉强支持，营伍虽不致荒废，但难有起色。雍正得报，立即勒令其退休，另换精明强悍之员。雍正十一年，他发现兵部有两个老郎中已年迈力衰，还在户部素餐，就责备兵部，像这样的官员不但干不了什么事，还使得后进的官员不能升迁。于是让他们退休，同时下文各个部院清查这样的官员，发现一个，打发一个。雍正对兵部官员的任用，在制度上又不拘泥于已有成例。雍正四年（1726），陕西三边地方的驻防军队中出现职务空缺，在该省一时又没有合适人选。川陕总督岳钟琪上奏说，四川武职官员中多有屡经战阵堪任要职者，但按制度不能隔省调用，所以不敢越例调动。雍正指示他“不必拘例”，并说“部议不准，朕可特旨允行”。

雍正还要求对有作为、敢担当、不平庸的官员的任用不要循规蹈矩。雍正元年，他在指示湖广总督杨宗仁破格提拔人才时，就要求杨宗仁，如遇到有作为的贤能之员，就破格提拔，不要按资历升转。他也对广东总督郝玉麟讲，在用人问题上“万不可拘泥一法一策也”。田文镜在主政

河南、山东期间，清正廉洁，积极推进雍正新政，狠狠打击贪官污吏，大力整顿官场作风，成绩斐然。雍正称他为模范总督，号召高级官员向他学习。

在雍正治下为官，平庸